

群体凝聚力： 智利圣何塞矿难成功救援的奇迹密码

□ 李洁宇

享有“铜矿王国”美称的南美洲国家智利，长期以来成为世界上出口铜最多的国家。2010年8月5日下午14时，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以北800公里左右的圣何塞铜矿内，70多万吨岩石突然塌落，中央通道瞬间被堵。当时在地下作业的有两组矿工，靠近入口的一组矿工受到惊吓，快速逃离出来脱离危险。但另一组被困地下700米处。2天后，第二次落石又把通风井堵住，专家估计，矿工被成功营救的概率不足1%，一时间全球瞩目。之后，历经惊心动魄的69天艰苦卓绝的救援，33名被困矿工最终成功升井，无一人死亡。智利此次矿难成功救援世界罕见，可谓奇迹。整个过程中，救援人员在政府指导下，依托高技术，果断救援、科学救援、协同救援，为顺利救出被困矿工提供了保证，给世界重大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留下诸多启示。

事前防范与自救互救能力

从根本上说，矿难救援不应该成为奇迹，预防矿难发生才是真的要务。整个营救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期17天的搜寻和联系被困矿工，第二阶段是为期52天的救援实施。在这场矿难救援中，地下紧急避难所对于矿工延续生命起到了关键作用。起初，救援队认为被困矿工们凶多吉少，毕竟地下缺水少食，空气也十分稀薄。但幸运的是，矿难发生时被困矿工正在应急避难所用餐。此处不但坚固通风，而且还储备了大量的食物、淡水及一些急救用品，包括外用酒精、药品等，这些储备在救援人员打通“生命通道”前为矿工们提供了“生命依靠”。通过此次灾难，智利的地下避难所制度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矿产行业建立有效完

善的安全制度提供了一种防范性的思路。矿难发生后，对于地下的33名矿工来说，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获救的那一天。在濒临绝望的处境之下，矿工们自发组织起来，对给养进行了分配。在等待救援人员进行“生命探测”的17天里，他们每48小时喝一小口牛奶、吃两小勺金枪鱼、一小片蜜桃罐头和一块饼干，并且很快就建立了生活区和日常生活秩序。他们甚至还利用照明系统模拟白天和夜晚，通过分享故事来打发时间。他们展示出的是团结和坚持，背后体现的则是娴熟的应急预防和自救互救能力。

全面动员与应急组织能力

矿难发生后，智利全国高度关注，时任总统皮涅拉迅速终止了访问，第一时间到矿区慰问矿工家属、协调救援工作，并对救援作出了明确承诺。武警、军队、消防及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点，组织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救援团队，其中包括救援人员、医护和一个专门实验室，负责设计救援所需器械和设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专业化手段保障矿工生命体征和情绪稳定，甚至还邀请美国宇航局专家来向营救人员提供建议，借助航天员在太空中的生活经验，为被困矿工在空间狭小、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保证生活质量提供借鉴。为确保救援成功，应急指挥团队制定了3套方案，方案一可靠但速度慢，方案二灵活性强但尚未经过测试，方案三速度更快但精度不高。为了防止意外，3套方案并行。10月9日，方案二团队率先突破到地下避难所，此时方案一进展到85%的深度，方案三进展到62%的深度。后来的升

井过程也准备了两套方案，结合实际情况，经过综合权衡最终选择第二套升井方案，采用卷扬机下井救人。在紧急且高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应急指挥团队展示出了高超的感知能力、快速整合深层知识的能力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国际协作与技术保障能力

矿难发生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世界都开始驰援智利矿工，澳大利亚提供了开凿救援井的液压挖掘机，加拿大提供了石油钻机，奥地利提供了绞车和钢丝绳，美国宇航局制定了包括矿工的营养计划在内的一揽子措施，中国自主设计、研发、制造的重型起重机部分零件也浩浩荡荡发往救援现场。共有世界各国25家私人采矿公司参与了这场营救行动，1700名各国记者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当矿工们在地下和黑暗孤独斗争时，矿工的家属们在地上安营扎寨，建起了“希望营地”，这里的人们都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营地里的日常生活完全不用担心，每天都有从世界各地运来的捐赠物资，从食物到衣服，足够家属们使用。

为了保证被困矿工的身体健，智利政府将科技在救援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大至重型挖掘机和“胶囊”救援舱，小至矿工的衣食住行都面面俱到，比如，为矿工送了一些用透气布料制成的T恤和短裤以及在袜底加入铜金属丝的特制抗菌短袜，防止他们出现皮肤问题……这些手段给被困

矿工“全副武装”后再上保险。基于国际协作的高新技术保障，加之救援实施团队严格执行和快速创新，整个救援推进顺利，奇迹才得以产生。

奇迹背后的忧思

奇迹令人振奋，也令人动容。但这场灾难留给人们的不应该只是紧张与欢喜的感受，更应该是思考和警示。智利矿山资源丰富，多家国际公司竞相开采，虽然在大型矿山的勘探开发上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一些中小企业的私营矿山却存在设备老化、缺乏安全保障等问题。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智利矿业事故每年平均造成34人死亡，2008年矿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3人。此次矿难，圣史蒂芬第一矿井公司承担矿工安全方面的主要责任。有报道称，在该公司所属的矿井里，过去6年有3人死于矿难，150多人在事故中受伤。而该公司也多次忽视安全方面的警告，并因违反安全规定而遭到罚款。国家地理矿产服务局作为重要的监管部门，未能妥善检查矿井的安全和工作环境，在明知是危矿的情况下仍允许其重新开放而遭到指责。这些情况着实值得深刻反思。

矿难通常造成伤亡的危险性极大，世界上每年至少有几千人死于矿难，发展中国家矿难发生的频率尤其高。因此，需要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成灾之前，切实提高隐患排查治理质量、坚决杜绝问题隐患“纸面整改”，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至关重要。

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 典型案例

找准化解基层治理难题的路径

□ 金 刚

治理之道，重在基层。近年来，我国基层治理在“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理念引领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和社会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基层治理中仍存在不少亟待关注的问题，需要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高质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路径。

随着我国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体制、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的转型，或因环境变化而引发原有结构和行为方式的不适应，致使基层治理面临一些困境。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需要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有的基层党员干部领导干部的“蝇贪”问题、涉黑涉恶问题、生活和工作作风问题、不作为和乱作为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仍时有发生，对基层社会的社会生态、治安状况、经济发展等产生不良影响，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这些群众身边的基层腐败问题虽不是普遍现象，但也表明，基层党的建设特别是农村的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仍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关键在于高质量推进基层党建。因此，如何优化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把党建引领的实际效果最终体现在基层治理的效果上，仍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传统社会治理与现代治理需求还不相适应。一方面，社区治理模式存在“一锅煮”的倾向，基层治理力量、治理资源与居民需求存在错配现象，传统治理手段与精细化治理要求不匹配。具体体现为，社区居委会、基层乡镇疲于忙于各种事务，社区负担沉重，加之分块切割的居住形式，基层群众对社区事务参与热情不高。

另一方面，治理资源悬浮，与基层群众诉求不匹配。资源下沉不充分、供需不匹配、利用不合理，有的部分以属地管理代替职能管理，摊派工作任务到基层，有的部分将派驻力量下沉到基层，但仍然各自为政，部门条块之间缺乏协调与协同，社区基层无法对其进行整合。

就业和收入问题对基层治理依然形成现实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会弱化侵蚀已有的成果。当前，三年的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伤害，有的影响可能还会延续，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新就业群体面临一些风险。其表现为基层社会就业仍有不小需求，收入增长缓慢，诚信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会进一步催生和诱发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何扩大就业、增加收入，防止就业和收入压力与社会治理问题相互传导，既是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当前基层治理必须关注的现实挑战。

网络舆论对基层治理造成诸多压力。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迭代更新，网络的即时效应和放大效应更加显著，尤其对基层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网络上各种造谣、诽谤、诋毁事件时有发生，电信网络诈骗、网络黄赌毒、网络暴力引发的一些人思想的混乱，侵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蚀着基层治理的思想根基。因此，如何进一步治理网络舆论乱象，扼制其消极影响，进行正确的思想文化引导，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任务。

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塑造工作任务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

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没有良好的社会心态，就没有良好的基层治理秩序甚至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社会心态是由个体心态组成的，包括党员干部心态、青年学生心态、专家学者心态、基层群众心态等。目前，基层社会一些群体的不良心态如浮躁心态、社会戾气、炫富仇富、过度宣泄情绪还是存在的，这些都是基层治理的隐性障碍。因此，如何通过塑造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来增强向上向善、自尊自信的心理驱动力，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仍是一道社会治理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并作出部署。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为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夯实党组织在基层的根基。一方面，推动基层治理由单兵作战向协同治理转变。在纵向上，完善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组织体系，将党组织向基层延伸，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在横向上，完善社区各类社会组织、非公经济组织内的党组织设置，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基层治理格局，形成基层治理主体多方参与协同共治局面。另一方面，发挥党建引领和组织功能，完善党建组织体系，推动基层治理的组织融合、工作融合、资源融合。同时，学习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治理经验，打造出千千万万的基层党建组织坚强战斗堡垒，持续关注回应基层期盼，引领解决基层治理问题。

瞄准富民安民及时有效推动基层群众减压减负。“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其中的关键在于及时有效为基层减压减负。受疫情影

响，基层部分群众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增加。为此，需要增强富民政策措施目标的一致性，及时解决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特别是在降费减税等工作当中，积极采取务实举措，缓解基层群众的压力负担，有效推动基层群众减压减负。此外，还要切实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确保重点群体就业稳定。

以法治化方式推进网络社会治理工作。当今信息化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极大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行为方式，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事务、社会治理都越来越依赖网络而开展。同时，网络的双刃剑效应对基层治理的挑战日益显现。法治化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和难点，也是推进网络社会治理工作的关键和难点。因此，以法治化为关键多渠道推进网络社会治理工作，有效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是标本兼治之策。

充分激活文化动能为基层治理提供智慧。文化是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最无形的力量。文化所蕴含的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秉持执两用中的智慧等，对基层治理尤其是塑造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弥足珍贵。比如，传统文化中关于刚健有为与休养生息、长远与当前、整体与局部、隐性与显性、内部与外部、精神与物质、社会与个体、法治与德治、自然与社会、贫穷与富有、行善与作恶等的经典论述，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能够提供辩证性、系统性、统筹性的方法支撑。



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城中村改造，一头连着民生保障，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今年以来，城中村改造备受关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对我国超大型城市城中村改造进行全面部署。城中村改造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积极稳妥把这件好事办好，对于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三个提升”，建设宜居城中村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重要的城市发展举措，从政策层面到具体实施，都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城中村可持续发展。

一是全面提升公共安全。城中村是城市发展的特殊载体和重要单元，是许多外来建设者梦想开始的地方。然而，城中村普遍存在的火灾风险高、风险隐患多、安全意识薄和救援难度大等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城乡全面发展的短板。因此，需要将保障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城中村自建房安全隐患。同时，城中村的安全保障措施，还需加强物业管理、建立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监控设备、合理设置交通指示标志和完善消防设施等。

二是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扩大国内需求使得城中村改造需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不仅是对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还要突出功能导向。如细化研究不同群众的安居乐业需求，持续改善道路、水电、通信、排水等基础设施，进而高水平建设一批复合型社区综合体。另一方面，还要强化全龄友好理念，科学布局养老托幼、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让居民能够方便快捷地享受到城中村改造后的幸福生活。

三是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城中村人居环境改造，是城市精致管理的重要一环，更是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一方面，每个城中村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脉和非遗民俗传承。这是构成城中村居民社会网络的重要纽带以及本土元素认同的重要基础。因此，需要通过保留和提升原有的文化元素，打造具有历史文脉和地域特色的社区空间，进而实现与城市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城中村是城乡混合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构成较为复杂，治理体系也体现出城乡交叠的特征。为此，需要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推动形成改造后可持续运营的治理机制，切实提升新社区的治理效能。同时，还要依托既有的环境布局，注重公共空间的打造和绿化美化的工作，营造宜人的居住环境。

着力“四个探索”，打造城中村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生活

城中村是城市的最小“细胞”，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格”，需要着力推进城中村全体在地成员实现深度融合，让城中村每一个新市民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一是探索城中村人口融合指数，不断强化“新城市人”的身份归属。一方面，开展“创新外来人口城市融合行动”，构建接地点、具有地方特色、更具实操性的城中村人口融合指数，结合实际将“身份认同”“政治参与”“社区治理”“人文关怀”“基础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进行量化分析。另一方面，基于城中村人员复杂、具有不同类型服务管理要求的特点，进一步发展社工服务，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外国人在内的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需求能够得到妥善回应，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生活，激发外来务工人员的社区认同和城市认同，不断强化“新城市人”归属感。

二是打造协同性城中村改造工作机制。在城中村改造中，工作机制的健全完善主要表现在党

城中村改造，怎么推进，如何改？

□ 蔡旭

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之中。一方面，探索推行一社区（村）一房东协会，发挥近邻先锋联盟作用，通过协会章程、议事协商、房东租客轮值管理等措施，增强房东、租客参与家园建设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对城中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状态实时监测，推动完善城中村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助力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提高融合工作效能。

三是设立城中村融合治理与青年发展工作站。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多，外卖、快递等新业态行业网点密集，如何帮助这类群体融入并转化为参与村庄治理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是城中村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关键着力点。一方面，推广设立城中村青年发展工作站，为推进城中村可持续发展增加新的动力。看似简单的物理空间，但可引导更多的“新城市人”积极主动参与到文明创建中来，为城中村的改造激发不竭活力。另一方面，配备流动党员服务管理站和暖蜂驿站，为外来人口参与城中村治理提供教育阵地、工作阵地、服务阵地和意见反馈窗口等，让广大城中村居民充分享受到城市发展福利。

四是探索全体城中村居民议事机制。一方面，结合精神文明实践品牌建设，融合议事会等议事形式，探索外来人口参与的居民群众议事平台。如在城中村党组织的领导下，组建不同形式的群众志愿服务队伍和自治组织，动员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同时，开展法治教育和法律援助活动，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按照精益、精确、细致、严格的原则，通过基层治理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的精细化，实现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具体化、人性化。另一方面，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找寻背后所蕴含的治理需求，实现对城中村有关问题接诉即应、闭环督导的治理全流程，赋能精准的供给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